

1987-2007

New Historiography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西方史学前沿 研究评析

李小兵 田宪生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2007

**New Historiography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西方史学前沿 研究评析

李小兵 田宪生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史学前沿研究评析/李小兵,田宪生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7
ISBN 978-7-5326-2504-8

I. 西... II. ①李... ②田... III. 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7038 号

责任编辑 陈翔燕

装帧设计 杨钟玮

出版人 张晓敏

西方史学前沿研究评析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75 插页 1 字数 204 000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2504-8/K·521

定价: 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4322465

前 言

21 世纪初,西方的历史学界正经历着一场重大的学术变革。它孕育已久,由渐变到突变,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的史学理论,改变了历史研究方法,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面对这场史学变革,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历史学家褒贬不一。他们中间有的积极探索,有的持批评态度,有的观望等待。因此正确把握当前西方史学变革的方向,对于加强中西学术交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向国内同仁和师友介绍西方史学研究的前沿发展,以批评的方法分析史学研究最新动态,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是我们编集本书的初衷。

自 19 世纪下半叶,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留学的中国海外留学生和学者,随西学东渐,开始介绍西方史学。20 世纪初,在欧洲学成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传播,在中国引起了传统史学的革命,奠定了以唯物史观为特征的现代中国史学的基础。20 世纪上半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介绍了西方史学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大批西方史学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当时最新的史学理论名著。西方史学的传入,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化史观帮助寻求社会进步的学者摆脱封建史学历史循环的陈腐理论,实证主义同中国史学中求实的精神结合,加强了史学方法的客观性。20 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客观历史原因,中西史学界的交往中断了近 30 年。

1978 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国际学术交流的大门。中西历史学者开始了新一轮互相了解,史学交流再次活跃。作为这种交流的一个部分,一批有志于史学研究事业的青年学生和学者,到美国大学攻研历史。同

半个世纪之前的留美学子一样,他们感到有责任以独特的方式加深中美历史学界的相互了解。本书各篇的作者,都生长在中国,并在中国受教育,对中国非常了解,他们又在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接受系统训练,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们在美国大学任教,有的已工作长达 17 年之久,对美国和欧洲的学术界非常了解。他们长年来做历史研究,著书立说,在西方史学界已有一定影响,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有不少研究专著被牛津、剑桥、斯坦福等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有的还获得了美国历史学界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奖。他们教学经验丰富,研究成果累累,对美国和欧洲史学界有清晰的感性认识和深刻的理性认识。这里呈献给国内读者们的论文集,就是他们为加强中西史学交流所作努力的结果。他们总结各自专长的研究领域,批评分析该领域在西方的最新发展动态,使本书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和实际参考价值。

本书共收论文 10 篇,内容涉及当代西方史学研究前沿发展的多个侧面。这里所谓“当代”,主要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 1987 年到 2007 年的 20 年。这里所指的“西方”,又以美国和欧洲为主。应该指出,当代欧美史学门类繁杂,流派林立,一本论文集很难囊括。因此,作者和编者均无意去“全面总结”当代欧美史学。本书中的每一篇论文,评价一个特定的史学研究方面,深入介绍其主要理论、动向、代表性学者及其著作,特别注意介绍该领域最近几年的最新动态、争议热点及突出最前沿的状况。由于每一篇论文的作者,都是在这一领域作了多年研究的专家,他们不仅仅归纳概括了相关研究课题的发展脉络、最新趋势、理论建构等方面,而且也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这些新动向发生的背景和原因,并提出作者本人的独到见解。

作为本书的作者和编者,希望将我们在美国史学界多年的观察、思考和研究成果总结出来,奉献给国内的读者,以自己的一得之见跟国内的同行和师友交流切磋。当然,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只能参考,不能全盘照搬。换言之,中国的史学同仁既可以向西方的史学界学到许多新的理论和先进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从他们存在的问题中吸取不少教训。同时中国史学界的真知灼见也需要通过对西方史学的具体分析才能深化,从而加深我们对西方史学的认识,以便对西方的史学研究成果进行正确的扬弃和吸收。

本论文集自组稿到出版,历时两年,是与下述组织及个人的积极努力和大

力协助分不开的,他们是“美国华人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Professors of Social Sciences in the U. S. , ACPSS)行政主管、副会长田宪生博士和“中国旅美历史学会”(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 S. , CHUS)的成员们。在编辑过程中,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中部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Oklahoma, UCO)的教授李晓晓,研究生陈宛君、洪振恩(Jason Hunter),以及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中部大学作客座教授的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刘悦博士,做了大量的电脑编辑工作,中国农业大学李玥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芷诺在编辑与校对工作中,付出了他们的努力。特借此书跟读者见面之际,向他们表示诚挚谢意。

李小兵 田宪生
2008 年元月于美国

目 录

前言	(1)
中国的民族、边疆问题及其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	刘晓原 (1)
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述评	卢汉超 (24)
妇女与城市空间:女性主义研究的新视角	程为坤 (49)
中国古代史中的宗教与妇女研究	姚 平 (73)
从全球视角观察人类的过去	
——新全球史思想和治史实践	徐 洛 (90)
美国国会与对华政策研究的最新发展	许光秋 (113)
越南战争:美国史研究的困境	倪 亭 (130)
赫尔利使命与美中关系的发展	田宪生 (157)
华人的进步及美国社会对华人地位的影响	宋京一 (174)
美国华人研究的现状及发展	李小兵 (195)

Contents

Editors' Note	(1)
Frontier, Ethnicity,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erritoriality	Xiaoyuan Liu (1)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hinese Urban History	Hanchao Lu (24)
Women and Urban Spaces: A New Perspective in Feminist	
Research	Weikun Cheng (49)
Religion and Women in Traditional China	Ping Yao (73)
Promoting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Modern World History: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Recent History Texts in the U. S.	
.....	Luo Xu (90)
Current Historiography on U. S. Congressional Policy toward	
China	Guangqiu Xu (113)
Vietnam War: A Difficult Topic in the U. S.	Ting Ni (130)
Patrick J. Hurley and U. S. -China Relations	Xiansheng Tian (157)
The New Hi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s	Jingyi Song (174)
Historical Review of Chinese Immigrant Literature in America	
.....	Xiaobing Li (195)

中国的民族、边疆问题及其 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

刘晓原

文章介绍近年来美国学术界有关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边疆问题的论著,并提出笔者对相关问题的看法。美国学术界在研究清代民族关系的形成和中国版图的扩展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研究 20 世纪中国的有关问题提供了出发点。冷战结束后,苏联多民族共同体的瓦解和族群冲突在国际政治中的日益彰显,美国学者加强了对中国 20 世纪民族政治的研究。发生在不同时期的蒙古、西藏、新疆的民族分离运动及其现状受到格外关注。文章的第一部分将概述有关代表性著作的内容及主要论点。第二部分提出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的命题,主张把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边疆问题放到一个跨越 19、20 世纪的宏观历史框架中来理解。

The article introduces recen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eal with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and related issues. It also lays out this writer's view on these issues. In recent years, numerous studies on the multiethnic system and 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the Qing Empire were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set the departing point for relevant works on 20th century China.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multiethnic system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thnic conflic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ve heightened scholarly interests about 20th century China's ethno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veral important

works have been published, focusing on the ethnic separatist movements that took place in Mongolia, Xinjiang, and Tibet in different times.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describes briefly the contents and arguments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in this category. The second part puts forward an argument about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erritoriality, suggesting that modern China's ethnic and territorial issues be understood in a macro-historical framework that bridges the 19th and the 20th centuries.

关键词：边疆 (frontier)，民族 (ethnicity)，领土属性 (territoriality)，近代转型 (modern transformation)，西方学者 (western scholars)

18~19 世纪之交的德国哲学家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曾经说过：“历史学家是反向的预言家。”一方面，这也许是对历史学家专以发表后见之明为己任的戏谑；另一方面，则是对历史学家往往用自己所处时代的观念褒贬过去的含蓄的批评。中国以不同的地理、文化、政治、人口形态立国几千年。如果我们用今天对“边疆”、“民族”的理解来研究中国的地缘形体和国民构成的历史变迁，恐怕难免陷于倒读历史的误区。实际上，在国际学者当中连是否可以用这两个概念来界定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都有不同意见。比如，遵两位主编之命，本文的第一个任务是简要介绍美国学术界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状况。可是领命之后才发现，美国史学界并没有一个有关中国的“边疆民族史”领域。以 2006 年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为例，年会分设“跨界、跨地区、图书馆、教学”、“朝鲜”、“东南亚”、“南亚”、“日本”、“中国和内亚”等 6 个大专题组，其中以“中国和内亚”组的内容最为丰富。该组共有 113 个专题讨论，17 个与中国的民族和陆海疆有关的议题则融于其中。又例如，美国亚洲学会杂志《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在书评栏目中把“中国”和“内亚”分别列项。2005 年 11 月的一期把一篇有关清代准噶尔战争的书评列入“中国”类，而 2006 年 2 月的一期却把一篇有关中华民国时期的内蒙古的书评列入了“内亚”类。可见，美国同行在梳理有关中国边疆、民族的历史研究的脉络时，遵循的逻辑混乱。进一步地探究即可发现，一般被中国学者视为中国边疆、民族史

的“内政”研究,而在美国同行眼里可能是“中国”与“内亚”地区的“对外”关系史,但是,中外学者在界定历史研究上的这类歧见,不应成为双方互相吸取研究成果的障碍。

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对中国近代以来的“领土属性”转型提出一些看法。我认为,这个转型过程恰恰是造成中外学界对上述“内政”、“外交”范畴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转型的结果,不但在近代意义上确定了中国作为国家的地缘形体,而且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构成。由此可见,有关中国边疆、民族的研究绝非仅是一种无足轻重的边缘猎奇,而是事关中国立国根基的重大问题。

在上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国的重新崛起已渐显端倪。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中国发展轨迹时所表现出的贫乏,使得有关中国历史的实证研究更加为人所瞩目。一批探讨自远古以来中国在东亚和更大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的著作应运而生。囿于笔者阅读范围的局限,以下仅限于介绍近年在美国见到的一些英文著作,这些著作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处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通论及清代以前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孔华润(Warren Cohen)的近著,《处于中心的东亚——与世界交往的四千年》(*East Asia at the Center: Four Thousand Years of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孔华润是美国研究中美关系史的权威学者之一,他的名字对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这部著作等于是—部东亚国际关系通史,书中将古代中国与周边王朝和部落政权的关系,与中国近代以来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一视同仁。考虑到一般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的有限知识,作者有意避免了在叙述中对传统东亚国际关系文化和近代西方国际关系规范加以区别。

究竟在东西方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在国际关系和行为上的“文化”差异?大约40年前,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领衔,一批学者合作出版了《中华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本书的出版确立了一派观点,即认为传统的中国“世界秩序”是在儒家唯我独尊观念指导下的、以朝贡册封制度为特征的等级国际关系文化。15年以后,这种观点受到了针锋相对的挑战。以蒙古史权威若萨毕(Morris Rossabi)为首的一批学者,也是通过集体努力,出版了《平等相处的中国:10到14世纪的中央王国和它的邻国》(*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本书作者们以宋代前后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关系的种种个案研究为例,说明“平等关系”并非是一种近代以来为西方所特有的国际交往形式。古代中国的中原王朝也曾以平等关系与他国交往,也曾有订约、划界、遣使一类的实践,甚至曾经以“下国”身份维持与北方强邻的关系。这些个案研究证明,中国的所谓“传统国际关系文化”的内容,远比朝贡册封制度所表现的要丰富。其后不久,拜克维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的《中亚吐蕃帝国》(*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巴费尔德(Thomas J. Barfield)的《危机四伏的边疆:游牧帝国和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1989)又以各自对吐蕃、匈奴、突厥帝国的研究,突破了以往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研究路数。这些著作通过分析中亚诸帝国与中国的关系及它们对中国的政略,建立了一种对古代内亚“国际关系”的独到解说。例如,巴费尔德的研究表明,在与中原王朝的频繁往复的战和关系中,草原帝国的决策者们往往视形势而定,在“外边疆”策略和“内边疆”策略之间做出选择。

以上著作在论点和方法上已与费正清一派有显著不同,但是,在理论上对费正清学派以文化特质区分中西“世界秩序”提出质疑,是由一个中国文化背景和西方教育兼备的国际关系学者在最近完成的。许天田(Victoria Tin-bor Hui)所著《立国以战:古代中国和早期近代欧洲比较研究》(*War and State Found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用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在秦统一以前的多国状态和早期近代欧洲的无政府国际关系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两者在观念和实践方面大同小异。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在秦以后立国于大一统,而欧洲则在早期近代以后步入多国并立的民族国家体系?在作者看来,这种区别并非源于各自的文化特殊性,而在于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在中国或欧洲是否适时地产生了能够在国际斗争中完成和维持统一的自强机制。

除了上述争论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另辟蹊径之作。例如,埃尔文(Mark Elvin)的《古象遗踪: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是一部有关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的开拓之作。通过对中国农耕文化及国家疆域扩张过程的探讨,《古象遗踪》为我们呈现出华夏文明的“生态边疆”的历史发展轨迹。迪柯斯莫(Nicola Di Cosmo)的《古代中国及其敌手:东亚历史上游牧强国的崛起》(*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涵盖了从春秋到汉代中原王朝与北方列强的关系,但其主要贡献在于对有关学术的综合梳理。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北方边疆有四类。第一类是散见于考古发现中的各种政治、文化、经济集团之间的早期“北方边疆”关系,在这类关系中并不存在明晰的“中华——异族”界限。第二类是以中华——异族文明界限为基础的“文化边疆”,但这类边疆是处于一种交融状态,并没有无法逾越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的鸿沟。第三类是在匈奴出现以后在中华王朝和匈奴政权之间出现的“外交边疆”,反映双方在政治、领土、贸易、经济生态方面的关系。第四类是司马迁笔下的边疆,即以中华为主轴对北方边疆的历史叙述。“司马迁的边疆”既为后世研究内陆亚洲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也开了中华中心论的先河,成为后来上千年单方面历史叙述的鼻祖。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发生于雄踞中原和凌驾大漠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反复的军事、外交斗争,造成了世界上蔚为奇观的人类活动的遗迹之一——长城。因此有南宋人氏陆游的悲愤诗句:“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又有20世纪革命家毛泽东的豪言壮语:“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在中国边疆、民族关系的历史研究中,长城是经久不衰的课题。在中国北伐战

争结束后不久,20世纪美国内亚研究的前驱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统一后的两千年中,长城虽然具有防卫功能,但主要是一道立于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永久的文化分野”^{〔1〕},这种观点对以后几十年的学术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及至20世纪90年代,以沃尔准(Arthur Waldron)的《中国长城:从历史到神话》(*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为代表的新研究,开始对拉铁摩尔作出修正。沃尔准认为,有关史料并不能证明自秦以后,中国便有了一座亘古不变的“长城”,以后不同时期的中国统治者,也并非都热衷于筑墙或一概对塞外游牧部族采取排斥的政策。今日所见的长城,其实是明代皇帝修建的“边墙”。但是近代以来,“长城”逐渐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被中外人士赋予各种不同的意义。英国学者劳维尔(Julia Lovell)的《长城:中国与世界的抗衡,公元前1000年到2000年》(*The Great Wall: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BC—AD 2000*)(New York: Grove Press, 2006)是有关这个主题的最新专著。在劳维尔的书中,拉铁摩尔的千年长城论已被看成是一个神话,代之而起的观点是,在中国历史上时起时伏的“长城”,反映了封闭和开放心态的交替。

有关清代的著作

恰如国内“戏说”、“正说”清代故事的电视连续剧在数量上压倒其他题材,近些年来美国学者的清史研究也日见蓬勃。满人以其北方王朝的力量入主中原,统治了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汉人臣民,从而继元朝之后使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斗争在中国再次上升到了空前的地位。因此,任何清史研究都难以避免对“民族政治”的探讨,美国学者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下文仅择要介绍。

珂劳丝丽(Pamela Kyle Crossley)是近年来在美国著述最丰的研究清代满族的权威学者之一。她的《透光宝鉴:清代皇权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认证》

〔1〕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58.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加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对清代满族皇权思想和制度的根源、发展及其演变做了详尽的历史考察。书中提出,清代自乾隆以降,开始用以满族为中心的皇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取代汉族儒家正统的天命思想。珂劳丝丽还把清帝国描绘为一种多族制度,其疆域及臣民构成包括了 5 个(满、蒙、汉、藏、回)民族文化,分布地域迥异,对清王室治权具有不同意义的“支持者群体”(constituencies),这些群体共处于清帝国而不相融合。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清代的的多族制度为 1911 年以后在中国出现的“五族共和”提供了历史根据。

在上世纪末,美国的《亚洲研究》杂志曾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辩论满族建立的清朝最终是否“汉化”。^{〔1〕}珂劳丝丽的书从意识形态分析入手,坚持认为清代满族自始至终都在汉人的海洋里维持了自身的族群身份(ethnic identity)。艾利特(Mark C. Elliott)的《满人之道:中华帝国晚期的八旗制度和族群身份》(*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赞同这一结论,但认为使满族得以维持族群特征的主要是体制。他提出,八旗制度不但是满族王室对清帝国内其他民族奉行“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的最重要的机制,也是使一般满人在高度“汉化”后依然得以维持其特殊族群身份的关键。李普曼(Jonathan N. Lipman)在他的《熟悉的陌生人:中国西北穆斯林的历史》(*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中,主张学者们应慎重处理近代以前中国的族群问题,避免用当代的或某些通行的概念和语汇反套历史现象。因此,在他自己的著作里,李普曼避免使用“汉”、“回”的概念,而是使用了在中文中没有贴切的对应词的“Chinese”和“Sino-Muslim”。加州大学在 2006 年出版了珂劳丝丽等人合编的论文集《边缘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文化、族群、边疆》,表明清代的族群关系

〔1〕 Evelyn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4) (November 1996): p829~850; 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 (1) (February 1998): p123~155.

及其有关政策和实践是目前美国学界瞩目的热点之一。

但是,清代满族在中国的统治毕竟是以武功为根基的,在中原取得统治地位之后,清廷继续在边疆进行武力开拓,这不仅最终造成了清代中国的广袤版图,也是满族统治者得以继续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原因。珀杜(Peter C. Perdue)在其新著《中国的西征:清朝对中央欧亚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5)中,把17~18世纪清廷在西北边疆进行的战争解释为决定清朝兴衰的关键性历史事件。在他看来,清廷在西北的成功影响了19世纪清朝统治者对来自东南沿海的西方影响的态度,因此也是清廷败于西方之手的原因之一,而清朝在西北武功的终止亦即满族统治者政治活力衰退的开端。米华建(James A. Millward)是专门从事新疆史研究的比较年轻的美国学者之一,他的专著《放眼边关:清代中亚帝国的经济和族群,1759~1864》(*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提出,满族统治者在马背上征服新疆以后,不得不越来越依靠汉商的钱袋和以汉族移民为主的民团来维持新疆的稳定。实际上,进入19世纪以后,珂劳丝丽所描绘的五族分离共处的大清帝国疆域已经开始了汉化的过程。

历史的巧合是,正当清帝国从内部开始汉化的时候,一股更强大的外来势力以前所未有的疾风暴雨之势,迫使古老的华夏文明进行全方位的改弦更张。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近作《英国课:帝国主义教授法在19世纪的中国》(*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杜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辛辣的笔锋,描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根据自身利益压迫中国政府在国家行为和观念方面向近代模式转型的情形。罗兹(Edward J. M. Rhoads)的研究则集中分析了满族精英阶层对这种外来冲击的回应。他在《满汉之间: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民族关系及其政治权力,1861~1928年》(*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hina, 1861~1928*)(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指出,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晚清国家制度和政治精英的概念发生了向“民族国家”的演化,此时的满人

也从一个“军事占领种姓”转变为中国的诸多族群之一。

从以上的简略介绍可以看出,美国或西方学者一般把清代以前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的关系作为“国家关系”处理,而在清史的研究中,则把满族朝廷与边疆民族的关系视为近现代中国多民族体制的先声。对此,辛国跃(音译;Leo Kwok-yueh Shin)在《中国国家的缔造:族群和明代边地的扩展》(*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f the Ming Borderland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提出不同见解。作者以明代中央政府和南疆诸部族的关系为例,指出即使在清代以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王朝不仅用归并和同化的方法开拓边地,而且也对边疆部族采取了认定和因俗而治的方针。显然,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疆域问题一样,既有延续,也有转型。

二

中国进入20世纪以后,满人统治迅速瓦解,以汉族为主导的民族主义政治成为中国族群关系和边疆结构发展的全新框架。美国学术界对20世纪中国民族、边疆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两种情况。其一是“边缘化”。见诸于文字的20世纪中国史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主要发生于东部各省的革命史、改革史、战争史、社会经济史和文化思想史,而1911年以前曾对构建中华帝国起到关键作用的边疆诸族则不再是历史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有关民族、边疆的研究因此成为仅仅是少数学者涉足的冷门。其二是“冲突化”。如果说美国的清史研究刻意指出满族统治者驾驭其他民族的技巧和维持多族体制的成功之处,那么有关20世纪中国民族、边疆问题的英语著作则主要着眼于汉族中央政权与边疆民族力量之间的冲突。但是,这种研究往往不能对满族统治下传统的“民族共处”何以向汉族统治下的“民族冲突”转化,做出贯通两个时代的解释。近年来国内对于所谓“三边”(边疆、边务、边政)问题的研究加强了力度,提出了研究古代和现代边疆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但是这些课题没有包括中国疆域及其有关制度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近代转型。一般认为,中国领土主权